

# 七读子弹库帛书

李零

现在这本书,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。这次出版,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“版本”搜集到一起,同时,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。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,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。我希望,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,让这批稀有的帛书,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。

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,无论从哪个角度讲,都是源头。

中国的书,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,而不是龟甲、兽骨和铜器上。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。《墨子》反复讲“书于竹帛”,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。这个定义是对的。早期中国,没有简帛,也就没有书。没有书,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?

20世纪初,“敦煌、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”是王国维说的“五大发现”之一。[1] 1942年,子弹库帛书出土,则是第一次发现帛书。

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,书都是写在简帛上。我们发现简帛,研究简帛,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。研究古文字也好,古文献也好,学术史也好,思想史也好,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。

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,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(古文、籀文和小篆、隶书),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。

不过,话说回来,本世纪上半叶,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。研究战国文字,当时有什么材料?数量最大,主要是玺印(还有陶文、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)。玺印上的字有什么内容?多半是地名、官名、人名,孤零零几个字而已。书,完全没有,长点的铭文,也非常少,几乎无辞例可寻。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《桐乡徐氏印谱序》(1926),就能明白这一点。当时,玺印是宝贝。很长时间里,研究战国文字的,原来只能研究印,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。

王国维,确实了不起。当时,材料那么少,他能考虑那么深,那么远,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之学和小学的关键。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,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

“古籀”,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,它们和篆、隶是什么关系。他的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》(1916),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。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:西土,秦系的籀、篆、隶是汉代“今文”的源头;东方,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“古文”的源头。如此宏论,远见卓识,洞察隐微,只有603字,一般人很难做到。

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,战国文字起步最晚,现在最热。其早期代表作有二,一是朱德熙《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》(1954);二是李学勤《战国题铭概述》和《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》(1959—1960)。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,一直影响到今天。

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。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。

朱、李两位的文章,今天看,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,甚至可以说,错得一塌糊涂,但平心而论,以当时的标准衡量,这却是最高水平。万事起头难。在我看来,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。特别是李文,更有大格局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,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。他把王国维的东、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,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,对后人更有启发。

他说,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《尔雅》十二月名,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。

书是用字写成的,但字不等于书。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,主要是啃字,而不是读书。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。

1949年以前,我们没有楚简。1950年代,开始有楚简,都是遣册(不但数量少,保存情况也不好)。1957年,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,只有残

简,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。战国古书,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。1993年,我们才有了郭店楚简。1994年,我们才有了上博楚简。在这之前,我们无书可读,要读,只有子弹库帛书。

没有书的结果,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,很多非常简单的字,当时都不认识,学者费尽移山心力,收效却甚微。

过去的工作方法,多半是不得已。

大规模识字,不可能是这种办法。

我记得,上博楚简发现后,裘锡圭先生曾说,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。原因是什么?就是辞例多了。一个字,反复出现多少回,再笨也能认出来。

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,我印象极深。

一句话是,战国文字难认,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。

另一句话是,某先生真怪,他认字,前提可能是错的,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。

过去,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。很多人都以为,一个字,形、音、义,字形最重要,通假在其次,字义是排在最后。破读,左转右转,主要是为了凑字形,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。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,我们却不难发现,字形分析往往是“事后诸葛亮”。真正的前提是什么?是辞例。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,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,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。甚至有时,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,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,或大致相当什么字。

我记得,朱德熙先生说,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。警察破案,他们的方法,有两条最重要,一是串并,二是排除。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,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,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。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

可能性中,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,使真相浮出水面。串并也好,排除也好,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。

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,一条道走到黑。方向错了,位置错了,费劲再大,全错。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,试探试探也就罢了,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,这是“侦探小说”,不是真正的“破案”。

大家迷信权威,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,或者即使犯了,也是高级错误。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。权威被假象误导,大家又被权威误导,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。

文字破译,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,一捅就破。说对了,三言两语,足够;说不对,千言万语,白搭。

1942年,子弹库帛书的出土,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蔡季襄的《晚周缣书考证》是第一部报导它和研究它的著作。这本书,印数很少,现在很珍贵。当初,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。后来,我自己也有了一本,是当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奈特(Michael Knight)先生送的。

这一发现太重要。

第一,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,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,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。

第二,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帛书。目前,帛书只出土过两次,一次是子弹库帛书,一次是马王堆帛书。帛书,它是第一次发现。战国帛书,它是唯一发现。

第三,战国文字,楚文字是大宗。研究楚文字,这也是个头。

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,今天仍然值得回顾。

中国学术界,目前有一股简帛热,热到不能再热。赌石一行,人称“疯狂的石头”;我们这行,也有“疯狂的简帛”。我万万想不到,这种当

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,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;网上称雄,看谁认字多,竟是一种热潮!

楚帛书,很宝贵,因为字多。它有九百多字,很多字,大家不认识,当时不认识,后来不认识,现在也没全部认识,所以一直有吸引力,吸引很多学者,反反复复读它。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但我读帛书,不光为了认字。认字只是手段。

简帛研究,认字是基础。认字是点,通读是面。没有点,焉有面,这个道理没错。避大就小,避虚就实,就字论字,慎言其余,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,还不容易犯错误。很多年轻人都以为,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。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了读书。如果是通读,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。我们别忘了,“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”,归根结底,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。更何况,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,天外有天。

认字,不光要从小到大,也要从大到小。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,辞例比字形更重要。这是读书的道理。

我读楚帛书,集中阅读,主要有七次。一次是1980年,一次是1988年,一次是1989—1990年,一次是1993年,一次是2001年,一次是2007年,一次是现在。前后长达三十年。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,错误固然很多,收获也很可观。

1980年。那年我32岁,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。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。楚铜器,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。刚才说过,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。当时,楚文字是绝学,熟悉甲骨、铜